

## 纪念

# 抗日烽火中崛起的重庆青年诗群

—写在诗人晏明百年诞辰之际

□张向阳



敝,文化职位极为稀缺。晏明在重庆的四五年间,六次失业,就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,不得不借住在大校园学生床铺之间的地板上,或是蜷缩在印厂车间阴湿的地面。1945年初春,远在湖北的妻子即将临盆,而他连自己都养不活,深夜绝望地徘徊在嘉陵江边,准备随时流而亡。诗友们找不到他,打着火把跑到江边拼命呼救……晏明才得以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其实,大多数革命文学青年都有共同的遭遇。徐迟最先是以诗人样貌跻身文坛的。1940年他来到重庆谋得中国电影制片厂编辑一职,仅仅一年便流亡香港。1943年返回重庆,在郭沫若麾下编辑《中原》杂志,之后又不得不跑到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充当翻译;沙鸥同样是颠沛流离,在重庆、川北、上海、香港等地辗转谋生。



1930年代末,大批抗日进步文人聚集到战时陪都重庆,使这座本来历史文化积淀就厚重的山城,显示出从未有的朝气和战斗张力,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青年诗人群落。他们大都在20岁上下,初涉诗坛却成长迅速,不仅充当抗日中坚的角色,亦成为日后数十年中国诗坛的主脉。

晏明就是其中一员。

## 从演艺新星到诗坛新锐

1938年,抗日烽火燃烧着年仅18岁的晏明,他决然告别父母,告别湖北云梦家乡,考入著名的忠诚话剧团,踏上抗日救国之路。他随团从武汉、经湖南过贵州再到重庆,一路表演街头剧、抗日话剧,演到情深处泣不成声。俊朗的外形,出众的才华,使他在剧团占有一席之地,他导演并主演的话剧《雷雨》得到时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曹禺的激赏,力邀晏明试进免试进入这座全国戏剧人仰慕的圣殿。

而此时,晏明已悄然皈依穆斯林,笃定只有诗歌才能彻底释放并燃烧他的爱与恨。除了演出排练,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泡在沿途的图书馆,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和文学书籍,阅读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叶赛宁,阅读艾青、臧克家、田间……他开始狂热地写诗。

1939年,剧团在重庆公演《雷雨》,轰动全国。晏明却宣布了令全团都惊愕的辞职决定,躲到租住的陋室里写诗去了。

在无数渺无音信的投稿之后,1940年阳春四月,处女作《涢水之春》在颇具影响的重庆《国民公报》刊登,从此他的抗日诗歌像是打开闸门一发不可收,在重庆以及桂林、衡阳、武汉、长沙、香港等地四处开花。他的长诗常常占据报纸副刊的大半个版面,诗句犀利短促,喷射着刺目的血色和激情。

晏明的迅速崛起得益于重庆浓烈的抗战浪潮。“抗日”成为人们相识、相知的热词,是划界分群的标尺。进步文化界在这里以碾压式的主导力掀起一波又一波抗日宣传,1941年端午节,首届中国诗人在重庆举行,由郭沫若主持大会,茅盾、老舍、阳翰笙、胡风、冯乃超及著名作家、诗人百余人出席。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布置下,先后举办了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臧克家、王亚平的祝寿活动。每一次活动都是进步文化界的节日,是对民主抗日力量的呼唤。各种规模的诗歌朗诵会更是随处可见。诗歌在民族危难之际,在重庆显示出它独有的投枪与匕首的威力。

晏明有幸亲临这些活动,年轻的生命在诗歌和抗日双重高密度洗礼下迅速成长。更为难得的是,他结识了茅盾、郭沫若、老舍、胡风、田汉、臧克家、何其芳、姚雪垠、刘白羽、王亚平、常任侠等文学大家。巨人的耳提面命,令他受益终生。晏明的《涢水之春》是被著名作家靳以教授慧眼识珠,从稿堆里挑出来的。屡屡退稿使晏明心灰意冷,已经决定另择他途为国效力。靳以的伯乐识马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。此后多年,靳以都以极大热情关注着这位年轻老人,不断校正着那双蹒跚的诗的脚步。

然而,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走进他生命深处的,更多的是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诗人。他们中有大学生、文员秘书,还有不少饥肠辘辘的失业者。国难当头皈依穆斯并不浪漫,不仅要面对黑暗势力的威胁挤压,更现实的是天天要饿肚子。茶馆是这些穷诗人乐此不疲的聚晤之处,叫上一壶清茶就可以高谈阔论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。

这个以抗日为硬核的青年诗人群落来去自由,既有形又无形,相见一次或许就会相知一生。晏明与当时在中华大学读书的地下共产党员、青年诗人沙鸥邂逅,就注定了55载的生死之交。尽管各自经历了只有小说中才有的坎坷与不幸,是诗歌令他们相扶相携,走完了蹉跎人生。

重庆青年诗群没有惯常的文人相轻,更没有尔虞我诈,在抗日大旗的辉照下,显现出共有的真纯、笃诚而又求新进取的特质,以致秉持了终生。即使几十年后重逢,相互看到的仍然是当年的彼此,只是多了几分沧桑。如果把当时活跃在重庆的青年诗人罗列出来,你会为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吃惊:光未然、戈宝权、徐迟、沙鸥、袁水拍、柳倩、苏金伞、牛汉、彭燕郊、邹荻帆、王晨牧、碧野、吕亮耕、甘永柏、徐放、魏荒弩、曾卓、吕剑、陈敬容、唐祈、绿原……无需讳言,当时他们还很青涩。但当他们经历过重庆熔炉的淬炼,穿越了生与死,最终叩开新中国的大门,便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诗歌史的书写者和缔造者。在共和国初创的几十年中,他们的名字仍然熠熠发光,是烛照新中国诗歌星空的耀眼群星。

## 从重庆诗群到全国诗群

由于大批文人骤然聚集重庆,再加上经济凋

敝,文化职位极为稀缺。晏明在重庆的四五年间,六次失业,就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,不得不借住在大校园学生床铺之间的地板上,或是蜷缩在印厂车间阴湿的地面。1945年初春,远在湖北的妻子即将临盆,而他连自己都养不活,深夜绝望地徘徊在嘉陵江边,准备随时流而亡。诗友们找不到他,打着火把跑到江边拼命呼救……晏明才得以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其实,大多数革命文学青年都有共同的遭遇。徐迟最先是以诗人样貌跻身文坛的。1940年他来到重庆谋得中国电影制片厂编辑一职,仅仅一年便流亡香港。1943年返回重庆,在郭沫若麾下编辑《中原》杂志,之后又不得不跑到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充当翻译;沙鸥同样是颠沛流离,在重庆、川北、上海、香港等地辗转谋生。

那个时候,凡眷顾缪斯的青年人,大都怀有创办诗刊的憧憬。那是一片专属的净土,可以大胆宣泄自己的情感和对诗的主张。但是真正能够走进这个憧憬的人却寥寥无几——关键问题不是刊号,而是资金。

1941年初,一直深陷失业泥沼的晏明,异想天开地向办刊“禁区”进发,他唯一的理由就是:在抗日汹涌浪潮中,大城市惟有重庆没有诗刊。这位年方21岁的初生牛犊,先后叩开了郭沫若、老舍、臧克家、田汉、王亚平、徐迟、柳倩的家门,向他们请教,也请大咖们赐稿。“为抗战而歌,为民族解放而歌”是办刊的唯一标准。资金方面,与合伙人菲北、宋瑚各掏一点;让印刷厂先印刷,卖掉书后再付印刷款;请书店先付款后售书……《诗丛》创刊号就这样闪烁着羸弱的光焰,出现在重庆诗坛地平线上——1942年3月,将永远镌刻在晏明的生命年轮中。

然而,骁勇的年轻人终究没能迈过资金门槛,第二期拖至5月份才勉强出刊,此后各期就茫然失望了。晏明和他的同伴依旧执拗地为这个命运多舛的“婴儿”奔走呼号。终于,1943年诞生了第三期,并借《新湖北日报》副刊出版了《诗丛》恩施版(半月刊),共六期。晏明像是跑过超长马拉松,精气耗尽,《诗丛》不得不无疾而终。

多年过后,晏明谈起这段往事隐现出丝丝骄傲:因为《诗丛》填补了重庆抗日诗坛的空白,在民族危难时刻发出了如火似电的呼啸。

当新中国大幕徐徐开启,诗人们的憧憬与才情再次引燃。

王亚平、沙鸥和晏明当年在重庆结识,同为《诗丛》殚精竭虑,现在殊途同归又聚首北京,且同时供职于北京《新民报》,三人分别担任总编辑、副总编辑和文艺副刊部主任。

当欢庆的锣鼓敲毕,诗人们有些落寞:一个旭日般的泱泱大国,一片有着3000年诗歌历史的沃土,怎能没有一本诗刊?人们希望尽快破解这个谜题。

王亚平、沙鸥是最积极、最热情的奔走者,1950年1月1日,新中国首创的大型诗刊《大众诗歌》诞生了!

大众诗歌社成立大会盛况空前,在京的最优秀诗人都纷纷赶来。《大众诗歌》编委由王亚平、臧克家、艾青、田间、力扬、袁水拍、沙鸥、晏明组成。王亚平任主编,沙鸥任副主编,沙鸥、晏明为执行编辑。《大众诗歌》的主旨,顾名思义:提倡大众化诗歌,走大众化诗歌道路。《大众诗歌》系月刊,十六开本。由大众书店出版、发行。

郭沫若极为兴奋,提笔挥毫,为诗刊题写了刊名。

《大众诗歌》果然不同凡响,创刊号首印8000册,一抢而空,不得不在一周年后再版。

创刊号第一页是毛泽东的手笔“诗言志”三个字,这是1945年为徐迟题写的,系头一次公开发表;郭沫若为《大众诗歌》撰写了专稿《关于诗歌的一些意见》,这是郭老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诗歌创作与繁荣发表意见。创刊号可谓名家云集,臧克家、艾青、田间、徐迟、林庚、严辰、王亚平、邹荻帆、沙鸥等都拿出了为新中国放声高歌的新作。

人们无法度量1950年代初始,诗人们到底释放出多大的热情。他们都身兼数职,手中同时料理几份工作,还要拼命创作出一批批新诗作,否则就要掉队。编委们并非空挂虚名,每个月都要聚首,检点过往的一期,确定新一期重点。那是个“激情满怀、万众一心”的岁月,《大众诗歌》始终紧贴着时代的风口发出诗歌强音。

当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时候,《大众诗歌》又联手各界创办了《抗美援朝诗·歌·画刊》,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。参加创刊和编辑工作的有诗人王亚平、楼适夷、严辰、沙鸥、晏明、吕剑,音乐家有李凌、瞿希贤、张文纲,漫画家华君武、丁聪、方成。沙鸥、晏明任执行编辑。诗、歌、画聚集一堂,可谓出版与文化界的双重创举。

当《大众诗歌》1950年第12期付梓的时候,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由于文化、出版界调整,诗人们工作多有变动,《大众诗歌》不得不依依惜别她的读者。但历史会永远铭记,在新中国最初的年代,是《大众诗歌》唱出了第一支“诗之歌”。

当然,历史也不会忘记有一批忠诚于缪斯的青年才俊,曾经穿越岁月的重重围剿,为新世界的诞生披肝沥胆。那一个个已经离去的坚毅而青春的面孔,因为深情缅怀而变得清晰英俊,并成为后人心中的永恒。

1944年初冬,当晏明离开《武汉日报》时,又一

原上草  
臧克家书



## 记忆



华君武(左)与曹禺 邹士方 摄(1989年春节)

对于戏剧大师曹禺,我是先观其剧,再读其书,后见其人的。

上世纪60年代我曾在首都剧场看过北京人艺演出的曹禺名剧《北京人》,那时我年未及弱冠。现在回忆起来仍怦然心动。大师级的作品加上一流的演出,使我深深地陶醉其中。

1966年夏天“文革”初起,“破四旧”、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,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的作品都成了“毒草”。当时西单的中国书店库存了大量的“四旧”书籍,为了及时处理,收回一定的资金,内部允许执介绍信的“革命组织”购买后供批判用。当时开个介绍信易如反掌。我的小学同学李睿奇拿到了学校的介绍信,开了一批古今中外文学艺术、历史哲学著作书目。来到书店,按打折的价钱购买到了几十本个人喜爱的书籍。其中就有一册《曹禺剧本选》,内中包括三个剧本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北京人》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北风呼啸的日子里,独自一人锁在蜗居中,坐在熊熊的火炉旁读“禁书”的滋味。

以后的10年正是这些“禁书”哺育了我逐步走上美学、文学艺术的道路。

1986年11月25日我因为撰写《宗白华评传》而去曹禺家中采访,宗白华先生的母亲是安徽方氏,曹禺已故的夫人方瑞也是这个方氏家族的一员,论起来算宗先生的表妹,曹禺当然就是宗先生的表妹夫。那次他在本子上为我题写了“大道本无我,青春长与君”,寄予了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。

1987年我与一位朋友共同撰写了三万多字的《原野》艺术成就论,寄请曹禺先生提意见。不久他寄回原稿并附信:“邹士方同志:承赐寄来稿《原野》艺术成就论,十分感谢。奈近几月一直犯心脏病,无力捧读,至感歉疚。兹奉寄尊稿,并致谢忱。敬祝大安,曹禺1987.2.17。”

艺术大师虚怀若谷、平易谦逊的品格令人感动。曹禺先生绝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,总是那么谦和,对于后辈,总是那么亲切地以礼相待,使你增强创作研究的信心。后来这篇研究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发表在《西北大学学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固原师专学报》上。大师后来还写了三张条幅赠我,内容都是唐诗,遗憾的是,现我只珍藏下来一件,内容为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。

曹禺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1988年他转而担任全国政协常委。全国政协大会开幕式后见到许多老朋友,非常高兴。在晚餐时,话多得不得了,酒也喝得特别多。吴祖光对我说:“曹禺是人来疯!”晚上他可受了罪,他本来就有心脏病,夜里发作起来,连连打电话给服务台,亏得抢救及时,没有出大危险,只好回家静养。

1988年3月我去采访大师,那天正好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陪同香港戏剧家周采茨(周信芳之女)在他寓中访谈。刘先生我本来相熟,而采茨的姐姐采芹(英国著名戏曲家)我又曾经采访过。最后大师建议四个人在一起合了影。这一切使我感受到前辈大师处处接济后辈,提携后进的一片赤诚之心!

曹禺寓中悬挂着关山月的《梅花图》,上题:“莫道人间春色晚 岂忘雪里寸丹”。一九七九年岁冬于北京 曹禺同志篆正 关山月。还有李可染绘赠他的《漓江烟雨图》和黄永玉绘赠的《荷花图》。也有曹禺自书屈原《离骚》句:“日月忽其不淹兮,春与秋其代序,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迟暮。汨余若将不及兮,恐年岁之不吾与。丁卯曹禺”。

3月20日我写了2000多字的对他的采访记请他审定,他看后表示满意,并谈了很多写作的事:“敢为常语谈何易,百炼工夫始自然”……“常语”、“自然”才是最高的语言艺术,谈何容易?“李白乘舟将欲行”,都是常语,却是千古不厌的诗句。现在写文言诗尽是旧套,没有新东西,不现成,不眼前。眼前景、眼前字、眼前的感情写出来才好。”“有的作家苦心炼字,来得不自然。总让人觉得他费了好大劲儿。这同年轻时受的教育和旧时的修养有关。有的作家不是文章别扭,是人别扭。老舍自然,口语化自然。老巴(巴金——笔者)也自然。鲁迅有时用挺深的字,但深刻自然,他的杂文、小说都是这样。《故乡》写他小时候坐乌篷船,听水声,句子简单极了,把眼前水乡的风景和真挚的感情织在一块儿。”至于我,有时自然,有时不自然。我岁数大了,才知道写得不好刻意摆弄。我有许多真话要说,可一到笔下就涩了。我不是怕打棍子。我想写一点好东西,但我的苦恼是写不出来。不是唐僧念的紧箍咒,反而是我自己的紧箍咒……让我写《明朗的天》,我不想写,但没有办法……”

望着曹禺大师那真诚而痛苦的神情,我感到有一股电击般的震动。

曹禺先生十分激动,他在我的本子上奋笔疾书:“敢为常语谈何易 百炼工夫始自然。士方兄留念 曹禺 一九八八.3.廿日”

大师的期望,岂止对我一个人呢?

1988年春天我与曹禺先生有过一次长谈。

话题从他新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:“我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,那时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政协大会,心情十分激动。以后一直在全国人大。现在,30多年后又回到了政协,可以说是回到了自己的家。我当然高兴,各个方面的熟人朋友都在政协,又可以时常见面了。政协范围这么大,包罗了那么多的人,真是了不起。从政协的发展,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。十三大以后,民主空气确实比以前浓厚了。现在说了过头的话,说了错话,再没有人打棍子。政协的各方面人士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,得到采纳,为改革和开放做出了很大贡献。另外,政协在某种意义上,是起了润滑剂的作用,这种作用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。这次请吴祖光继续担任政协委员,就很说明问题。他最近完成了电影剧本《孟姜女》,寄给我看,十分精彩。”

艺术家的思维敏捷,讲起话来滔滔不绝,并伴随着各种手势,颇富戏剧性: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感到太阳出来了,朝气蓬勃,欣欣向荣。我始终认为,中国知识分子是爱国爱人民的,也是爱党的……科学方面我有自豪感,体育方面我有自豪感,文艺方面我也有自豪感。我们的文学艺术大大地进步了。我仅举两部电影和两部话剧为例。《老井》和《红高粱》在国际上得奖不是偶然的,我看了确实不错,我们敢于把中国落后的地方开放给别人看,就是需要胆量的。只有看到自己落后方面,迎头赶上,才能进步。《老井》赞颂了中国人民不甘落后,不做自然的奴隶的奋斗精神。100年没打出井,现在终于打出来了,这象征着中国的复兴。对土地深沉的情怀,对妇女解放和爱国主义的讴歌,是《红高粱》激动人心的主旋律。主人公自己选择爱情,争取爱情,多么大胆,这与《牡丹亭》和《西厢记》中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完全不同。有人说:你们专写中国的落后,外国人专门看中国的落后,因此才得奖。这不对,这是保守的说法。话剧《狗儿爷涅槃》和《桑树坪纪事》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面貌,反映出封建主义、官僚主义等等对农民的压迫。有人说这是给共产党抹黑,我说不是,这是勇敢,勇敢才能面对现实。中国是一个农业国,土地问题、农民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题材,需要很好地反映。”

最后他谈起他的苦恼:现在开会太多太长,一年之中占去了大部分时间。他希望能在近几年做点实事,写点东西。他毕竟是78岁的老人,记忆力已越来越差了。

我曾为曹禺先生拍过一些照片,其中一张他与漫画大师华君武的合影颇为自然。两位大师微笑着,戏剧大师还把一只手指在漫画大师的肩上,十分亲切。时在1989年春节。

30多年过去了,曹禺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。他除了留给我们宝贵丰富的戏剧遗产,还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。

曹禺的真诚和痛苦  
——曹禺诞辰10周年纪念  
□邹士方